

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

同道著

國學大師之死

康有为 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

王国维 殉身为清室，不忍旧学亡

辜鸿铭 只有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

梁启超 保国保种必先存学

章太炎 吾死，中夏文化亡矣

鲁迅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蔡元培 以科学方法揭国粹真相

胡适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陈寅恪 华夏民族文化终必复振

顾颉刚 历史传统不能一天中断

梁漱溟 中国之出路在儒学复兴

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

冯友兰 阐旧邦以辅新命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

同道著

國學大師之死



當代中國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学大师之死：百年中国的文化断裂/同道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0

ISBN 7-80170-526-2

I. 国... II. 同... III. 名人-传记-中国-近代
IV. K82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7233 号

出 版 人 周五一

总 策 划 臧云鹏

责任编辑 宗 边 陈凌云

特约编辑 位灵芝 黄志伟 贾晓寰 李平收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 ddzgch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 16 787×1092 毫米

印 张 18 2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 (010) 66572159

“国学”复兴大趋势

同道先生的这本书，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的书名——《国学大师之死》。书中所写的 13 位国学大师，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但为什么集中写他们的死亡呢？换句话说，通过国学大师们的死亡，读者能看到什么呢？

就这个问题，在写作过程中，我们的编辑与作者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现将我们出版者的理解推荐给大家：

为了说明作者的意图，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学”究竟是什么？这也是本书在前期调研时，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延续章太炎的定义，即包括文字学、经学、史学，学术界多持此论；另一种是比较通俗的理解，即“国学”就是传统文化。

本书认为，“传统文化”的说法失之宽泛，而文字学、经学、史学的说法又过于学术化，不能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知识水平。本书在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国学”是一种以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学术知识为载体，以知识阶层的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体系。

因此，书名中的“死”，就具有了两层含义：

一、通过对 13 位国学大师死亡情形的再现（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时代背景、临终遗愿、死后哀荣），解读其文化价值观与现实社会的激烈冲突，展示其在时代变局中所作出的历史抉择，由此使大家看到 13 个不一样的人生命运；

二、正是从文化价值观传承的角度讲，“国学大师之死”，象征着“国学”的衰亡，抑或说，在民国一代学人手中，“国学”的价值内涵发生了大断裂。

极端而言,已成为一门“绝学”,或曰“绝唱”。

那么,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发生了这次大断裂呢?这就要看这个价值体系的载体——文字学、经学、史学等国学知识——割断与知识界有机联系的时间和原因。

整整一百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是这次历史性大断裂的开端。这就是废止延续了 1300 多年的科举制度。

1906 年 9 月 2 日,光绪帝颁布上谕:

自丙午科(1906 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七十多年之后,美国人吉尔伯特·罗兹曼评价道:

科举制在 1905 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 1861 年沙俄废奴和 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废除科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自隋朝设立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此消亡;二是维系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就此消亡。此后,作为儒家价值体系最高形式的载体——“经学”,在新式学堂中失去了主导地位,成为与物理、化学、英文、美术、体育平等的专门学科。新式学堂从 1905 年的 8277 所,迅猛增长到 1909 年的 59117 所;学生从不足 26 万人增长到 1639641 人。

进入民国,历史又往前迈了一步。1912 年 1 月 19 日,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

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

5月，第二道令：

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

7月，蔡氏又在全国第一届教育会议上提出：

各级学校不应祭孔。

学校祭孔之风从此断绝。

1919年，历史再往前迈进一步。“全国教育联合会”和“国语统一筹备会议”推动国语运动，并和“新文化运动”配合，掀起了强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改文言文为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教育部接受胡适建议，下令：

小学一二年级国文课本改为语体文^①，两年内小学全部教科书全将旧时文言文课本改为语体文，中学教科书也逐渐改编为语体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再明令各省：

中小学采用统一的语体文、注音符号和国音。

从此，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经典，从中小学课堂上消失，而在高等学府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只有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的，才有可能作为必修课程学习。当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因为：一、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8~13岁是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段，而大学生的年龄通常超过17岁；二、他们在中小学校学习的语言是白话文，考上大学以后要看古籍，必须依赖《辞海》、《辞源》。

从这个角度讲，有人把本书中的13位学人称作“最后的国学大师”，并非言过其辞。

^①即白话文——作者注。

读到这里,有读者也许会问:大清皇帝和民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了这些政策的出台?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时代的主题是压倒一切的力量。

纵观 1840 年至 2006 年间 166 年的历史,我们能清晰地看出中华民族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时代主题:救亡——强国——富民——和平崛起。

1840 年至 1945 年的主题是“救亡”,期间经历多次由外族入侵引起的战争:

1840 年至 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1856 年至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英军火烧圆明园;

1894 年至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精锐部队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进攻德国在山东租借地,强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在中国东北发动侵华战争;

1937 年,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全面爆发。

这段屈辱、悲惨的救亡史,直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美军舰“密苏里”号上,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一刻起,才告结束。

至于如何救亡,国人起初遵循魏源^①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理念,向西方学习。但其中的“技”几经变迁,从军事科技到维新变法,从改变政体到排满革命,从教育人才到文化启蒙。这多种救亡方

^①1794~1857 年,晚清思想家,曾任江苏布政使。

法,呈递进纵深的轨迹向前摸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闭关锁国的天朝威严扫地,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开始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封疆大吏们放下了乾隆皇帝和嘉庆皇帝对待英国使节马嘎尔尼^①和阿美士德^②的“大国”傲慢态度,发动“洋务运动”。不过,随着科学技术一同潜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使当时的精英阶层十分警惕,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于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早在1861年冯桂芬^③所写的“采西学议”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着力打造军事力量的“洋务运动”历时35年,至1895年甲午战败结束。期间,本书所讲述的13位国学大师,除辜鸿铭为“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的华侨,康有为在1887年偶游香港看到一些西方书籍外,其余基本没有接触过西学,大概是因为军事是政府的事,与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直至甲午战败,军事至上理念破产,知识分子才为民族忧患意识驱使,向西方寻求“器物”(坚船利炮均为有形的器物)之外的“技”,于是才有了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试图引入西方政体,打破了传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动摇了“中学为体”的价值观。梁启超将康有为称为“新中国史第一章”,其“新”字大概就是针对新的价值体系的萌芽而言。

维新变法虽因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而流产,但维新思想却因此影响了一大批学人。1898年,28岁的蔡元培为了读懂西方原著,组织东文学

①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乔治·马嘎尔尼勋爵率领400多人船队来华,借为乾隆帝贺70寿辰,提出在中国沿海设立贸易港口,在北京常驻使节。按照大清仪制,乾隆要求对方下跪叩头。双方发生争执,最后采取妥协的办法,马嘎尔尼勋爵单膝跪地向乾隆帝递交国书。乾隆虽赏赐甚丰,但拒绝了英方的所有要求。

②1816年,英王派遣罗尔·阿美士德勋爵访华,再次提出通商要求,遭到嘉庆皇帝拒绝。因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被驱逐出境。

③冯桂芬(1809~1874年),清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曾师事林则徐。

社,开始学习日文;21岁的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受业于藤田丰八等,萌发研治西洋哲学的念头;17岁的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读到了《天演论》,接受进化论。包括康有为的“死对头”章太炎(1869~1936年)在逃到台湾后也开始大量阅读西方著作。陈独秀的话最有代表性:“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在张之洞等朝廷重臣看来,“康梁”的变法并非不对,而是过于激进,没有争取到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其实,内忧外患之际,清朝政府也在进行着自我救亡。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第二天,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获准。

当时,以清朝体制为精神象征的学人,并不在少数。康有为自然算一个,他于1927年3月死于食物中毒,人们怀疑为慈禧所派刺客所为,因为自维新变法开始,他便以保光绪而去慈禧为己任。他死后,弟子们向溥仪求谥号“仁忠”而不得,是因为他劝说溥仪不与日本人合作。因此也有人认为他被日本人毒害。

辜鸿铭(1857~1928年)从西方浪漫主义价值观的视角,看到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可贵之处,至死留着清朝的辫发。他的学问和观点虽为当时的主流学术界所轻,死时门庭冷落,但却得溥仪赐谥“唐公”。

没有功名却在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1877~1927年)是13个人中唯一的自杀者,他的死实在是因为价值观无法寄托于未来的革命政府,而不得不以殉清而终,得溥仪赐谥“忠愍^①。”

梁启超之死为西医误割右肾所致,但死前仍撰文为西方的科学精神辩护。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主张开明专制。1919年考察一战后的欧洲,思想回归东方文明。

①què,诚实的意思。

中，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被不加分别地矫枉过正，因而错过了推动中华文化向“第三种形态”更新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赖以“救亡”的实用主义精神的一个负面结果，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

也正因如此，后人往往忽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闯将思想的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尽管提出要“全盘西化”，但其目的是为了“再造国故”；鲁迅所鄙薄的只是宋以降的治国礼教，而对汉唐的大国气象十分崇尚。进一步说，仔细读完书中所选的 13 位国学大师，你就能发现：他们到了晚年，无一例外地向中国传统回归的迹象，只是程度、速度上有差别而已。这大概可以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历经“千年变局”而不灭的合理性。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清醒之人：梁漱溟就因为不满西化之风，“五四”时始读四书五经，并于 1921 年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证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钱穆当时就对这些放弃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人们提出疑问，深信中国文化和历史自有其独特精神，一生致力于“为故国招魂”。

三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强国”替代“救亡”成为新时代的主题。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洋务运动”。当然，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有本质区别。清朝是国门大开，引进欧美技术，依靠外债；新中国是相对锁国，引入苏联技术，自力更生。清朝政府最大的收获是北洋水师，而新中国则诞生了“两弹一星”，建起了比较完备的重工业体系。原子弹已经具备现代战争的“核威慑”能力，外族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却使昌盛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时机被错过。13 人中死于这一时期的只有一人。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通过对《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和清末名妓柳如是这两个女人的研究，寄兴亡于“心史”。1969 年 10 月因心力衰竭，肠梗阻、肠麻痹去世，时年 79 岁。

1978 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由“强国”转向“富民”。

近 30 年过去,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国逐步具备了建设强大而文明的国度的基础条件。但是,伴随着物质上的持续繁荣,西方文化也悄然浸染。特别是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崇,其标志事件就是 1990 年的“华盛顿共识”^①。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最后两位国学大师——钱穆和冯友兰——相继逝世。此前,顾颉刚与梁漱溟已于 1980 年、1988 年去世。

在他们死后,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但由于传统文化的薄弱,加上不可避免的历史实用主义的驱动,自由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被扭曲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在青少年中演变为“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极端个性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金钱为上”、“个人利益第一”。包括今天年轻的精英学者阶层,更多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有意无意忽视其《道德情操论》;强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倡导的人性本恶、追名逐利的内容,轻视他在《论李维》中对公民美德的重视,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我为主”而不及其余。

其实,西方国家自文艺复兴以来的 500 多年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已经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的衰落和复兴、与社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抗、政治自由主义等多个阶段,并且已经形成了新的思想传统: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相协调是维护个人自由的重要保障;个人自由应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自由主义者应从共同的道德善出发,为国家作奉献,对其他社会成员承担必要的义务,等等。这样的思想传统与我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岂是同一种东西?

^①1990 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与会者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 10 种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是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及私有化。

四

进入 21 世纪,时代主题又从“富民”走向“和平崛起”。

在大国姿态日益显现的今天,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文化层面的历史性隐忧。可喜的是,在废除科举整整 100 年后,我们迎来了“国学”复兴的曙光:

2005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授课;

1 个月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乾元国学教室”开办国学班,学员为 40 多名民营企业老板、银行行长、政府官员;

2006 年 8 月,复旦大学哲学系宣布在沪开办首个“精英国学班”;

数日后,清华大学宣布将在 10 月开办“中华文化精髓与现代企业谋略高级研修(上海)班”,与复旦大学形成两强抢滩之势。

在人大国学院挂牌的同时,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挂起孔子像开馆;

2006 年,武汉出现首家蒙童学馆;

2006 年,湖南平江、江西南昌、江苏徐州、重庆等地的“现代私塾”如雨后春笋悄然面世;

2006 年 7 月,上海出现全日制私塾——孟母堂。一个多月后,该私塾被有关部门叫停,旋即掀起轩然大波。“国学”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

在这股浪潮的背后,我们能体会到国家力量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素有“第二党校”之称,是执政党培养优秀理论人才的基地。2001 年 9 月,该校在校园内竖立起一座巨大的孔子像,举行揭幕仪式的时候,教育部的一位副部长参加,并发表讲话给予肯定;2002 年 11 月,成立孔子研究院,教育部相关司长参加成立大会。

这是否说明执政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呢? 答案是肯定的。

早在 2003 年 2 月,一本看似普通的《中华传统美德格言》就出版了。这本书由江泽民题词,李岚清作序。出版后,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的主要领

领导人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要求发放到每个中小学生手中，作为重要的课外读物。

2004年7月，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在海外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并指示“结合当前国家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从国家事业的高度，按照‘抢抓机遇、迅速突破’的指导方针加快推进建设”。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将“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任务与三大文明并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而“和谐社会”这一概念就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同月，纪念孔子诞辰的祭祀大典在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举行。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活动首次由政府举办，公祭由曲阜市市长主持，中央电视台面向全球直播。

除了国家力量，我们还能感受到商业力量在“国学”复兴进程中的助力：

北大、清华、复旦三所名校的国学班的学员耐人寻味。与人大国学院面对在校学生进行授课不同，这三所学校无一例外地将推广国学的对象定位在了民营企业的老板阶层，学费自2.8万元/年至3.8万元/年不等，授课时间每个月只有两天，平均价格超过了前几年泛滥成灾的经营管理课程。这是否又说明中国的先富阶层在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对精神归属感的向往呢？

至于“遍地开花”的“现代私塾”，则毫无疑问地将“国学”的复兴希望寄托在了我们的下一代。以“孟母堂”为例，在招收的12名学生之中，一半是教师的子弟，另一半则是成功商人的孩子。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已经悄然成为中国人精神之旅的主旋律。可以断言，其蔚然成风继而成为一时代的大趋势、大洪流，为时并不远矣。

那么，单纯地回归读经时代吗？当然不。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难道不令人担忧吗？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确实需要努力，不过我们希望更多的人相信我们和子孙后代的理性和智慧，更多关注大趋势、大洪流的来临。因为

这意味着在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重建民族精神的根基。

正如章太炎所言: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国家之存亡。

国学大师虽魂兮归去,然文化传承决不可断。又正如顾颉刚所言:

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前后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子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这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北京同道新文图书公司联合推出的这本书,我们愿她成为千万个读者点燃文化蜡炬的一根火柴。

如果您愿意和作者、编者交流本书内容或其他国学知识,请联系:010—64915748,publish@todonews.com

臧云鹏

2006年10月

目 录

前言：“国学”复兴大趋势

康有为：新中国史第一章

七窍流血，猝死青岛 / 002

谁毒死了康有为？ / 003

死后因“国学大师”而遭罪 / 005

“新中国史”第一章 / 006

忠于君主，更忠于思想 / 011

轶 事 / 015

康有为关系图 / 017

康有为人生轨迹图 / 018

王国维：与千年旧学共命运

自沉昆明湖 / 021

喧嚣身后事 / 024

遗书藏玄机 / 025

从文哲到经史的痛苦历程 / 029

千年旧学之光 / 030

轶 事 / 033

